

陇右文化研究丛书

主 编 雍际春 副主编 霍志军

QINZHOU SHANGKONG DE FENGHUANG



秦州上空的凤凰

——杜甫陇右诗叙论

薛世昌

孟永林◆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陇右文化研究丛书

主 编 雍际春 副主编 霍志军

QINZHOU SHANGKONG DE FENGHUANG



秦州上空的凤凰

——杜甫陇右诗叙论

薛世昌

孟永林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 / 薛世昌, 孟永林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161 - 2912 - 8

I. ①秦… II. ①薛…②孟… III. ①杜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856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金 泓
责任校对 王雪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25
插 页 2
字 数 380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大千世界，万象竞呈。因区域自然和人文社会环境的差异性，在中国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彰显着各地人们的文化气质。燕赵、齐鲁、巴蜀、三秦、荆楚、吴越等文化已广为人知。这其中，陇右文化更是因其所处的农牧交错、华戎交汇与南北过渡的区位优势，成为我国地域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的一朵奇葩，具有迷人的风采，散发着瑰丽的芬芳。

陇右文化源远流长。若从原始人类遗迹来看，从陇东华池县赵家岔、辛家沟和泾川大岭上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3.8万年前的“武山人”遗迹的发现，已昭示着陇右远古文化的曙光即将来临。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天水地区大地湾、西山坪、师赵村等遗址为代表的旧石器早期遗存，翻开了陇右文化源头的第一页。继之而起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文化类型，在多样化农业起源与牧业起源，中国最早的彩陶与地画、文字刻画符号、宫殿式建筑、水泥的发现，最早的冶金术和铜刀、铜镜与金器的出土，礼仪中心的出现，表明等级身份的特殊器具玉器的发现，贫富分化与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的出现等，这一系列与文明起源相关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成就，既为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提供了佐证、增添了异彩，也是黄河上游地区开始迈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在齐家文化之后的夏商之际，西戎氐羌部族广泛活动于陇右地区，并与中原农耕文化保持频繁的接触与交流，开创了农耕与草原文化相互介入、渗透和交融创新的文明模式。与此同时，周人起于陇东，秦人西迁并兴起于天水，陇右成为周秦早期文化的诞生地，并奠定了陇右以华戎交汇、农牧

结合为特征的第一抹文化底色。自秦汉至于明清，陇右地区民族交融不断，中西交流不绝，在悠久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兼容并蓄、多元互补、尚武刚毅、生生不息的地域文化特质。这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元素，成为华夏文化中最具活力的基因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华夏文明的传承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在国内各地域文化研究如火如荼、成果层出不穷，地域文化与旅游开发日益升温的形势下，陇右文化的研究却相对冷寂，只是在近年来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其中，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的同仁们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2001年，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学校陇右文化研究爱好者共同努力下，国内唯一的陇右地域文化研究学术机构——陇右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中心以开放的管理方式，以学校内部的学术力量为基础，广泛联系省内外的科研院所和相关文博专家，同气相求，共同承担起陇右文化学术研究和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重任。以期中心的研究成果庶几能为甘肃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

中心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12个春秋。12年里，我校的陇右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一是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初步构建了陇右文化的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为陇右文化研究和知识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催生和形成了一个省级重点学科，将科研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使陇右文化研究工作迈上可持续发展有了基础保障。三是2010年中心被确定为甘肃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陇右文化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搭建了平台。四是汇聚和成长起一支富有既充满活力又富有潜力的学术研究队伍。五是通过在《天水师范学院学报》长期开办“陇右文化研究”名牌栏目，编印《陇右文化论丛》连续出版物和出版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丛书”，为研究和宣传陇右文化营造了一块探索交流的学术阵地。在此基础上，产生一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在推进学科建设，服务甘肃文化大省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2010年，学校为了进一步加大对陇右文化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的扶持力度，将陇右文化重点学科建设作为重大项目，申报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专项经费，并得到资助，这为陇右文化研究基地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费保障。由此我们研究条件大为改善，先后启动了项目研究、

著作出版和资料购置等计划。现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陇右文化研究丛书”，即是著作出版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深知，陇右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但许多领域的研究几近空白，基础研究工作亟待加强。所以，对于“丛书”的编写，我们秉持创新的理念，科学的精神，求实的态度，提倡作者以陇右地域文化为研究范围，立足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学术特长，自拟选题自由探讨。只要有所创新，成一家之言，不限题材和篇幅，经申报评审获得立项后，即可入编“丛书”。

经过各位作者一年多的辛勤努力和创造性劳动，“丛书”按计划已基本完成。入编“丛书”的著作，涉及陇右文化研究的各方面，主要包括始祖文化、关陇文化、陇右文学、杜甫陇右诗、陇右旅游文化、陇右石窟艺术、陇右史地、陇右方言和放马滩木板地图等主题。各书的作者均是该校从事陇右文化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骨干，其中既有多年从事陇右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也有近年来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才俊。因此，“丛书”的出版，无疑是我校陇右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最新进展与成果的一次整体亮相；也必将对深化陇右文化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深知学海无涯，探索永无止境，“丛书”所展示的成果也只是作者在陇右文化研究探索道路上的阶段性总结，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与欠缺。作为引玉之砖，我们希望并欢迎学界同仁和读者多提批评指导意见，激励我们做得更好，以推动陇右文化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丛书”出版之际，正值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启动实施之时。这一发展战略确定了围绕“一带”，建设“三区”，打造“十三板块”（简称“1313工程”）的工作布局。“一带”就是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带；“三区”为以始祖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区、以敦煌文化为核心的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区和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兰州都市圈文化产业区；“十三板块”即十三类文化发展与资源保护开发工作，分别为文物保护、大遗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利用、民族文化遗产、古籍整理出版、红色文化弘扬、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品牌打造、文化队伍建设、节庆赛事会展举办等。这一战略以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为平台，对加快甘肃文化大省建设，探索一条在经济欠发达但文化资源富集的地区实现科学发展的新路子，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战略及其实施重点，也就是我们陇右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的主旨所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与服务社会是高校所肩负的神圣职责。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战略的实施，为高校与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契机，也为我院陇右文化研究学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充分利用陇右文化研究基地这一平台，发挥人才和学术优势，积极参与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为甘肃省文化大省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建言献策、奉献智慧。我们相信，我校的陇右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无疑在这一战略实施中大显身手，发挥排头兵的作用；也必将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战略的实施中进一步深化合作，不断提升服务社会的能力，并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学科生长点。

祝愿本套丛书的出版为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增光添彩！

雍际春

2013 年春于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

序 言

薛世昌和孟永林两位，都是我的同事，我们也同为九三学社之同人。在我没有退休之前，我们在中文系时常见面；在我退休以后，我们也不时相遇在会议或饭局。按说，我们应该不乏各方面的了解，但当他们说完成了一本关于杜甫陇右诗的研究书稿并约我作序的时候，我还是感到既喜又惊。

新的杜甫陇右诗研究成果即将出版，我当然是十分高兴的。杜甫于乾元二年（759年）流寓陇右，五个来月^①存诗117首，这些诗得到不少专家的高度肯定，如冯至先生在《杜甫传》中说：“杜甫的一生，七五九年是他最艰苦的一年，可是他这一年的创作，尤其是《三吏》、《三别》，以及陇右的一部分诗，却达到最高成就。”^②杜甫的《三吏》、《三别》早已是家喻户晓，比较起来陇右诗却知之者甚少。为此，我亦倾大半生精力潜心研究杜甫陇右诗，并殷切盼望更多的学者把目光投向这里，运用多种方法，通过多种形式，多侧面、多方位地研习杜甫陇右诗，以期彰显它们应有的艺术地位。而薛世昌和孟永林他们对于杜甫陇右诗默默的关注与悄悄的写作，无疑又一次扩充了杜甫陇右诗的研究队伍，这一书稿的问世不仅是杜诗研究的可喜成果，也标志着杜甫陇右诗研究一条全新道路的开拓与探索。

但同时我也感到有些吃惊。据我所知，薛世昌初以诗文创作名起文坛，继以执教高校写作课，渐渐受到青年学子的拥戴。虽然他后来确定研

① “五个来月”指杜甫当年在“陇右”（大概念、包括在秦州、成县、栗亭等）的大约时间，非指在“秦州”（小概念，仅指天水）的时间。杜甫当年在秦州约三个月。故书中言及“陇右”用“五个来月”，言及“秦州”用“三个月”，或“不到一百天”。

② 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07页。

究范围而至于文学写作之研究，再后来继续缩小学术范围而至于现当代诗歌的写作研究，并且出版过颇受好评的《文学创作论》、《现代诗歌创作论》、《论文学语言的来历及其使命》三本著作；虽然他近年来发表的多篇杜甫陇右诗研究的文章，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唐代文学，毕竟不是他此前的主要研究方向。然而，作为一个热爱现代诗歌创作，同时又从事理论研究的高校教师，他一直想追慕一位伟大的诗人以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一直想在诗歌的研究领域打通古今，于是，他就选定了杜甫，而他进入杜甫博大壮阔之诗歌世界的切入口，就是对杜甫陇右诗多年来的潜心研究。他的这一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孟永林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一直执教中国历史的相关课程，但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中，文史哲却是从来也不分家的，极具传统文人气质的孟永林，果然没有局限于历史的专业范围，他近年来发表的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文章，就极具文史的互通性。但是，我虽然对他在天水地域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进展深感欣慰，但他对杜甫陇右诗如此强烈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成果，还是让我感到了稍许的吃惊。同时，我对他和薛世昌的这种跨学科的学术合作精神，也表示发自内心的赞许。

就是怀着这样既惊且喜的心情，我认真细致地阅读了他们的书稿。我发现：薛世昌不只是学术研究没有边界——甚至可以说是不入规矩，而且其学术表达也没有边界——或者说他试图挑战某种学术表达的陈规俗矩。他以自己的一篇散文《公元七五九年的秦州》代为全书的自序，显然想为全书确立一个文学性表述的言说基调。果然，第一章第一节即以“动翻翔九霄：本书主题曲《凤凰之歌》”为题，通过优美的想象，将诗人杜甫的横空出世，描绘得彩翩翩，高远神奇。但在恣意想象的同时，他毕竟没有忘记正在写作的是一本学术著作，于是，第二节“凤凰意象：杜甫快意风云的精神图腾”，既破解书名《秦州上空的凤凰》，也“言归正传”——把凤凰意象与杜甫诗歌的关系，论述得全面深入。第三节高度概括了杜甫来秦州之前的生活轨迹，第四节单刀直入，以“壮游天涯”为基本命题，论述杜甫西向客秦的原因，既尊重各家定论，也敢于提出新说。

学术著作历来让人们敬而远之的主要原因，就是其纯粹的学理论述往往会让普通读者感到沉闷，这也是学术著作难于获得更大文化影响力的原

因之一。薛世昌他们显然想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于是第二章第一节，他们重施故伎，以“情景再现：杜甫一行到达秦州”为题，通过想象——当然是合理的想象——引入了电视专题片“情景再现”的艺术手法，形象地再现了杜甫一家当年到达秦州的具体情景。然后改换为学术口吻，对杜甫的部分《秦州杂诗》进行了解读，并着重讨论了杜甫当年在秦州采晒草药的“药生活”。读稿至此，我也终于明白了书稿的副标题：杜甫陇右诗叙论。叙述，同时议论。叙于所当叙，议于所当议，如行云流水，莫非就是所谓的文无定法乎？总之，这种文学性描述与学术化表达时有穿插、互成节奏的文法贯穿全部书稿，读来张弛有序，开合自如，应该是全书最大的特点。

除此之外，他们这本书还有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第一，对杜甫的陇右生活叙述清楚完整且不乏生动的细节。如杜甫在秦州梦见李白、知会阮昉、邂逅佳人、和杜佐叔侄相见、在西枝村和老友赞公相会、和赞公同游麦积山等细节，想象合理，刻画生动；又如他们在书稿最后推出的“雪泥鸿爪：杜甫陇右生活行程简表”，从“公元759年立秋日即7月8日杜甫在华州”开始，经“8月8日白露节，在秦州城”、“12月1日，自凤凰村出发告别同谷”，到“12月21日，辗转到达成都，开始了为期十年较为平静的蜀中生活”，第一次以“行程表”的方式，清晰地描画出杜甫一行当年在陇右的生活轨迹。第二，拓展出杜甫陇右诗研究的一些新颖课题。关于杜甫的陇右诗研究，虽然历史并不长，但各地学者的论述范围已极其广阔，而薛世昌和孟永林他们却仍然开辟出了一些前人未臻的课题与方向，比如，杜甫在陇右秦州的民间写作与平民情怀、杜甫的秦州知交阮昉的身世与思想、杜甫诗歌中“隐逸的尾巴”、杜甫在陇右的“药生活”与“目生活”、杜甫诗歌“随时敏捷”的写作特色、杜甫陇右诗诗歌意象的崭新天地、杜甫《盐井》诗的“以诗为文”现象、杜甫诗歌从“文之语”到“诗之语”的自然过渡等，虽然他们的论述可能不被所有的人完全信服，但毕竟可以引起其他研究者的注意，砖出而玉现。第三，在一些看似前人已有定论的地方，他们也勇于钻研考证，敢于力陈己见，如关于杜甫一行到达秦州时确切人数的考证，如对杜甫当时究竟有无登临麦积山的分析，如对杜甫陇右诗时空确定性的再认识，如对赤谷、积草岭、泥功山的位置考索，如对杜甫《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的独特解读等，

表现了他们严谨的学术态度与求实的学术精神。

阅读他们的书稿，我尤感兴趣的是他们在《后记》里所提出的“文之侠者”的人文精神，即一种伟大的“玄奘精神”：不需要暴力与打手为其开路，而仅仅凭靠着深沉博大的爱与坚定的信仰。我认为，他们写作本书，他们言说杜甫的陇右人生，就是为了张扬这样一种内在神勇的杜甫精神——不畏权贵而敢于诤谏、不畏贫寒而敢于辞官、不畏山恶水穷与万里饥驱而敢于“独立苍茫自咏诗”……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本书的作者之一薛世昌，也是一个诗歌写作的爱好者！曾几何时，写诗是一种时尚与光荣，可是时至今日，写诗却成为一种一般文化人诚惶诚恐的畏途。但是薛世昌却一直对诗歌的写作心存向往，笔存不弃，这不也是一种“独立苍茫自咏诗”的精神么？我相信，在对杜甫陇右诗甚至所有杜甫诗的研究过程中，薛世昌一定对诗人与诗歌有着更深的体悟与理解，一定会把自己的诗歌写作坚持下去！

最后，希望薛世昌和孟永林两位在尽职于教学、致力于学术、勤奋于写作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学术之路漫长而艰辛，希望我们潜下心来，意志沉毅，步调坚实，厚积薄发，取得更大的成就。

李济阻

2012年9月16日

有凤来仪

我不习惯也不喜欢无缘无故地就给人写序，所以我下决心同意写这篇序文，其中既有缘，其中也有故。

1997年秋，中文系领导责成我听一节准备调入我校的薛世昌的写作课，然后对他的教学能力与中文基本功作出评价，以助他们决定是不是要这个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后来的同事薛世昌。当时，他秦安味极浓的普通话，他对写作理论虽然陌生但并不隔膜的理解，他思维的敏捷和表述语言的现场组织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知道我在研究杜甫的陇右诗，就说：“聂老师，对杜甫的陇右诗，我也很感兴趣。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已有好多年了。”

显然，我和薛世昌是有缘的。

缘是一种事物，是一种只要产生了就会生长并终有果实的东西。

那一年在麦积山阅卷，我们住在同一个房间。这一次，关于杜甫的陇右诗，我们自然说得就更多了，比如我们就说到了杜甫到底有没有来过麦积山、他的《山寺》写的到底是不是麦积山。薛世昌有两个名字——他还有一笔名是雪潇，所以薛世昌的想法与行为往往也与我们这些只当教师的只有一个名字的人有些不同。比如在清水温泉，他就别开生面地把同事们带到了对面山上的李虎墓：“你们不要只顾着打牌了！到了清水温泉，就应该去看一下李虎墓。不到李虎墓，你就见不到中国风水的活标本！”比如到大地湾，一般人都在那个大厅里装模作样地看文化遗址，他却领着三五朋友在背后偌大的山坡上捡拾陶片：“如果你运气好，你就能捡到一块彩陶；如果你运气特别好，你就能捡到一块有花纹的彩陶！”而当时在麦积山，他也能够“另辟蹊径”。他说：“我知道一条小路，可以到达麦积山的山顶。天下好多人都到过麦积山，但是天下很少有人到过麦积山的

山顶。上面还有一个佛塔。在那儿极目远眺，美不胜收！”他一个劲儿地鼓动我：“我一定要把你领着去一下！”

于是我们几个就悄悄儿地披荆斩棘地去“登顶”了。虽然我由于年龄大心脏不好的原因，只登至半山就不敢再登了（我的喘息终于也把薛世昌吓醒了。他一再说：太冒险了！太冒险了！），但毕竟我也因此到达了麦积山一个人迹罕至的侧崖，我的人生也多了一样接近于历险的体验。

天水杜甫研究会成立，薛世昌积极参加，热情襄助。他甚至还对我开玩笑说：“我是一定要参加的，谁让我会写杜甫这两个字而且会背几首杜甫的诗呢？”在给电视专题片《杜甫在陇右》撰写解说词的时候，对什么报酬也没有的而且被别人改来改去的屈辱劳动，看在杜甫的面子上，薛世昌也是一忍再忍：“没有话语权的话语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聂老师，我们不能拍自己的片，我们就要写自己的书！”

在共同的教学工作中，我们的交往在继续，我们的缘也在生长。在共同的教学与工作中，他和另一个同事孟永林的交往也在继续，他们的缘也在生长，而且重要的是，他们关于杜甫陇右诗的研究，也在悄悄地进行之中。

大概是前年，我问起他研究的进展情况，他说：“聂老师，不急。杜甫来我们天水的时候是48岁，我准备在我自己48岁的时候，就把关于杜甫陇右诗研究的书出版出来。”薛世昌的属相是蛇，他的48岁，是2013年！现在一般人都是赶着评职称的时候或者赶着项目结题的时候出书的，但是他的这本书却是为着他与杜甫的48岁，他真是一个能为自己的心灵活着的人！

也许是天佑其诚，不迟不早，2011年，我们学校陇右文化研究中心以卓有成绩的研究，获得了一笔中央财政的资助，于是他们即面向全校征集相关研究成果。机会真是提供给那些有准备者的，于是薛世昌马上就提交了自己的著作。立项之后，为了让自己的心血之作在文献征引方面更为翔实，也为了让自己的论述在史实考据方面更为准确，他还提议自己的朋友孟永林和他共同合作：“目的只有一个：把这本书做得更好！要让它既对得起杜甫，也对得起国家资助。”

他们两个又紧锣密鼓地努力工作了一年。书稿杀青之后，薛世昌给我发来了这样一则短信：“聂老师：当年我调入天水师范学院的时候，是您

和富世平两个代表学校听了我的课。我相信你们两个一定对我是多加美言的，因为我最后很顺利地调了进来。我知道我当时的教学水平，其实是十分一般的。当时我就许下了一个心愿：以后我一定要请聂老师给我的书写个序。现在，这个时刻到了，所以，聂老师您一定要给我畅所欲言地写上几句。”

我们的缘，1997年开花，十多年来生长，现在终成一果。

虽然我年老体衰时疾时病，但这一次，我觉得自己实在没有理由推托。我同意了。我同时十分感动：我没有想到当年的那么一件稀松小事，却被他一直记挂在心上。我以前只知道薛世昌虽然在同事朋友间爱开玩笑，但在他不放心的人跟前却是木讷无语；虽然喜欢和同事们登山打牌喝酒吃饭图热闹，却是眼睛里进不得沙子；虽然自称要“重新做人”，却依然“嫉俗如仇”……我现在才知道他同时还是一个滴水之恩真要涌泉相报的人。现在，像他这样有情有义、爱憎分明的人，像他这样过了河却并不拆桥的人，还真是越来越少了。再说，孟永林也是我十分嘉许并看好的一位专心于学问厚积薄发的好青年、好同事！

在这样的心情下，我开始阅读他们的《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书稿。

公元759年立秋后，杜甫辞官华州，西向秦陇，寓居秦州三个月，又南奔同谷，不久又涉蜀道而下四川，其间创作诗歌近120首。薛世昌和孟永林两位即以此杜甫在甘肃土地上近半年时间的的生活与创作为叙述时空，基本清晰地再现了杜甫当年的陇右行旅，也一路梳理了杜甫陇右诗研究中向来的学术歧见——他们一边以情景再现等文学性手段具体描述杜甫当年的陇右行踪与生活情景，一边就描述时所涉及的学术问题展开了大量专题性的讨论。全书资料翔实、论述严谨——于是有骨；以高洁的“凤凰”而为杜甫的形象喻体——于是有神；叙述时敢于想象，讨论时勇陈己见——于是有力；立足于实证的考索而立意古远，高扬出杜甫作为一个“文之侠者”可贵的人文精神，即不畏权贵而敢于净谏，不畏贫寒而敢于辞官，不畏山恶水穷与万里饥驱而敢于“独立苍茫自咏诗”的内在神勇——于是有魂！骨肉停匀而形神兼备，于是就成了我对本书最大的阅读感受。

薛世昌和孟永林，他们一个学中文、一个学历史，一个是“60后”

一个是“70后”，但他们却有着许多的相似相投之处（比如他们都喜欢钻研天水的历史文化并且有一种身居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自豪感，比如他们也都喜欢中国的新旧诗歌），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相近的爱好，才促成了他们在本书中这次成功的合作。但他们也是各具性情各有所长（比如薛世昌的思绪飞扬与文笔精到，比如孟永林的文献功底与扎实考据），也许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的功力，才促成了他们在本书中这次完美的互补。阅读着他们对当年杜甫的陇右之行翔实而生动的描绘，领悟着他们对杜甫陇右诗全面而深入的论述，作为一个对杜甫的陇右诗研究多年且对杜甫的陇右生活略知一二的人，我确实感到了激动与高兴。我既为天水的杜甫研究之后继有人而激动，我也为诗圣杜甫千载之后又得知音而高兴！希望薛世昌和孟永林两位在今后的工作与生活中，把对杜甫的诗歌研究和对杜甫的精神继承结合起来，心怀天下而情系苍生，脚踏大地而思接云表，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很欣赏他们的书名——《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也赞赏他们在本书中大力打造“凤凰”这一祥瑞神鸟与杜甫人生命运之间多重隐喻关系的诗意努力，于是就将本序正标题定为“有凤来仪”。有凤来仪，就是祈愿一种吉祥与高贵，来到我们上空。

聂大受

2012年12月12日

公元七五九年的秦州(代自序)

“以后我可吃不到你的青菜喽”，公元759年一个冬天的清晨，决意南下同谷（今甘肃成县）的诗人杜甫，一定这么笑着对阮昉话别。而陪杜甫游历了秦州山川众多美景名胜，和杜甫一起敲钟南郭寺，击鼓隗嚣宫，现在眼含不舍的秦州隐士阮昉，也一定面有愧色地说：“可惜我们能给你的也只有青菜了。”

在秦州（今甘肃天水）人送给杜甫的青菜中，诗有明载的，有除架的瓠子，也有薤（小蒜）。杜甫秦州诗之《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云：“隐者柴门内，畦蔬绕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书求。束比青刍色，圆齐玉笋头。衰年关鬲冷，味暖并无忧。”^①可以为证。富者谢人以财，君子谢人以言。杜甫一介书生，他只有用诗来回报朋友。而公元759年的秦州大地赠给杜甫的，就不止青菜了，还有苦涩的橡实和满山遍野的草药。

公元759年的秦州古城，城深廓高，十万人家；红楼绿槐，商旅往来，是当时的西部重镇。白日里，农夫背镰，军卒催马；到了晚上，红衣女弹琴，苍苍汉吹笛，一派边关气象。杜甫来到这个边陲古城后，也自当昼看塞风吹云出山，晚听羌笛如泣如诉，并且面色庄重，热血奔涌，长发飘飘如同一个青砖城头上的英雄——他怎能不是一个英雄呢？莫非只有横刀立马者才当称英雄么？莫非一个搦管为民的诗人就不是英雄么？他的身躯是有些弱小，他行走在当时纷乱的大地上是有些默默无闻，那些从他身边骑着骏马奔驰而过的士卒，确实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头戴草帽脚穿麻鞋衣袖露两肘的男人杜甫，却实实在在是一个了不起

^①（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二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2页。本书所引杜诗均依据此版本，后文所引只在正文中以夹注形式注出杜诗篇名。

的书生英雄——在诗歌与文字的王国里，他几乎就是一个呼风唤雨的将军。

个人的苦衷，人类的悲痛，造化的暗示，如果我们注意到杜甫秦州诗里的这些内容，如果我们相信诗是一个人生活与感情的绝对真实，我们就应该承认，公元759年的秦州对于诗人杜甫的意义，实在不应该继续为人们所忽视。

少陵者，忠孝士也！一般人所知道的杜甫，确实也是一个“一字不忘唐”的关心政治的人。“佛让王维作，才怜李白狂”^①，在这两个方面，他好像也知道自己不如王维和李白，然而，他确实又是一个“哀鸣思战斗，迴立向苍苍”（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五）的诗人。只不过他一直不愿意心甘情愿地只做一个纯粹的诗人罢了。在他的理解中，那应该最后的选择。可是，秦州却让他最终改变了这一很难改变的人生。秦州隐士阮昉、长安时的老友赞公法师，他们和杜甫，在公元759年的秦州，一定有过非同寻常的会晤，道、释、儒三种人生的态度，一定在当年秦州的菊花与月下进行过友好而深刻的交流。这种交流会晤的结果，就是秦州大地上那种远离政治与王朝的清风吹遍杜甫的身心，吹落了他身上锈迹斑斑的官宦意识，吹醒了他心灵深处的平民意识。可以说，公元759年地僻山远的秦州，却用它的秋雨苦风成就了一个中国古代伟大的诗圣。

杜甫为什么最终又离开了秦州呢？

首先，是由于生活所迫。秦州百日，风霜雪雨，杜甫一家终于是“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杜甫《空囊》）了。杜甫对生活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屋可盖头，田足糊口，他就可以安居乐业。纵有报国无门的心灵隐疼，朋友与诗歌之手，也足以抚慰他的伤痛，给他一片高纵想象与诗思的白云，然而，“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杜甫《发秦州》），无论他如何自嘲，如何乐观，当他在那个风雪之晨离开秦州的时候，南下同谷之路，已非常现实地成了一条与普通老百姓东奔西走的“跑光阴”并无不同的“活路”。毕竟，杜甫一家不能只靠橡实和小蒜过日子。

^①（清）金昌长《叙第四才子书》曰：“犹记我友徐子能有《咏杜》一律云：‘读史《春秋》笔，大名垂草堂。二毛反在蜀，一字不忘唐。佛让王维作，才怜李白狂。晚年律更细，独立自苍茫。’此乃字字实录也。”参见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四）《唱经堂杜诗解》，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525页。